

《東華漢學》第 32 期；255-30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0 年 12 月

翻譯之外：
論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
所收《紅樓夢》譯本之多重詮釋

蘇恆毅*

【摘要】

宮崎繁吉的《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成書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當中選錄並節譯《水滸傳》、《西廂記》、《桃花扇》、《紅樓夢》等四種中國小說與戲曲，其中《紅樓夢》則以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的內容為翻譯對象。

此書乃《紅樓夢》早期的日譯本之一、且為宮崎繁吉於早稻田大學任教時的教學內容所集結之講義錄。翻譯形式上採逐段之和漢對照、並完整標示漢文訓點與文句解釋，以便於閱讀者與研究者進行參照理解。因此在文學翻譯與教學上有其重要性。

本論文以宮崎繁吉在《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之《紅樓夢》翻譯為研究對象。由於《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並不只收錄譯文，而是兼備宮崎繁吉對於小說作者、版本、流變、文藝美學等研究成果，因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此本論文先分析宮崎繁吉的《紅樓夢》研究成果，再進行譯文分析，觀察其翻譯特性，最後則是從《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整體選文情形，重估宮崎繁吉選擇「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為翻譯對象的理由，以此逐步評析宮崎繁吉在《紅樓夢》研究、翻譯與教學上的成果。

經由本論文的研究可知，宮崎繁吉採取「一人一主題」為選文標準，且強調選文在整部作品中的伏筆作用，經由單一事件貫穿小說整體發展，有引起外國讀者的閱讀興趣之效，以此兼顧文學研究、教學與推廣的功能，使中國小說與戲曲得以從其著作中在日本獲得關注。

關鍵詞：《紅樓夢》、《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日文節譯本、宮崎繁吉、劉姥姥

一、前言：《紅樓夢》日文節譯本的流傳與當前研究成果

《紅樓夢》的外文翻譯，除可促進海外的《紅樓夢》流傳與研究外，是否還能夠產生其他的效用與意義？若是將譯本作為語言與文學上的教學途徑，那麼如何從一百二十回的長篇鉅著當中進行選擇，並且對於所選回目賦予足以代表全書的意義及詮釋方式，以使教學者能夠經由文學翻譯，使學習者能夠體會到《紅樓夢》與所選回目的文學美感與異文化體驗？此點於現行的《紅樓夢》日譯本研究當中，是鮮少被提及、卻不可忽視的部分。

關於《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與應用於教學上的時間，據伊藤漱平的研究，《紅樓夢》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寬政五年（乾隆五十八年，1794）。¹雖然傳入時間極早，但《紅樓夢》實際作為語言教材、並且奠定日本紅學的歷程，卻是醞釀了近百年的時間。在明治六年（同治十二年，1873）時，日本與清廷簽訂邦交條約，此時設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校聘請了江戶時代的唐通事後裔與清人為教師，初期是以《今古奇觀》為南京話教材，至明治九年（光緒二年，1876）時，由於外交政策的因素，使北京官話成為通譯官的學習主流，遂以《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

¹ 參見日·伊藤漱平，〈《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江戶幕府末年至現代〉，《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448-449。此說亦為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所接受。然此傳入時間，經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所載錄的村上文書《差出帳》時間標為「寬政六年」，故而造成《紅樓夢》傳入日本時間有「寬政五年」與「寬政六年」兩說。宋丹即據此考察村上文書《差出帳》，認為此兩說的產生原因，是基於陰曆與陽曆的曆法採用之故所產生的混淆，因此《紅樓夢》傳入日本的時間，「寬政五年十二月」與「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均無誤，然換算為西曆，則當以「1794年1月」最為準確。參見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頁251。宋丹，〈《紅樓夢》最早抵日時間的再確認：基於對村上文書『差出帳』的調查〉，《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2輯（2017.3），頁227-242。

等小說作為語言學習的教材。直至明治十八年（光緒十一年，1885）東京外國語學校語學部廢止的九年間，《紅樓夢》一直作為高學年的語言教材，且該校教師亦與清朝官員有所往來，並討論《紅樓夢》。²於此時期，《紅樓夢》除了是文學家與漢學家的藏書外，森槐南（1863-1911）與島崎藤村（1872-1943）均曾節譯《紅樓夢》，且森槐南亦有〈紅樓夢評論〉（1892）此一論著，是以兩人對於日本文學創作與紅學研究均有重要的影響力，同時奠定了日本紅學研究與翻譯的基礎。³

稍晚於森槐南與島崎藤村二人，笹川臨風（1870-1949）、長井金風（1868-1926）、宮崎繁吉（1871-1933）三人均曾翻譯過《紅樓夢》，且三人的翻譯回目、文章性質並不相同。依孫玉明與宋丹的研究可知，笹川臨風是摘譯首回與末回的片段文字，並附於其對《紅樓夢》的介紹中；長井金風則是節譯與評價第四十五回，同時與《源氏物語》進行比較；宮崎繁吉則是節譯第六回，並以教科書的形式加以刊行。⁴由是可知，三人於《紅樓夢》翻譯時的回目選擇與譯文性質上，或側重文學層面的評介、或側重教學性質，各有不一。

然當前對於《紅樓夢》日譯本的研究，大抵集中於名家譯本與全譯本上，僅有少數論文曾針對節譯本與摘譯本進行分析，或將各類譯本置諸於日本漢學與紅學研究脈絡中觀察學術環境與譯本的產生情形。⁵較為

² 參見日·伊藤漱平，〈《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江戶幕府末年至現代〉，頁 456。此段歷史，亦可見日·森中美樹，〈語学教科書としての『紅樓夢』：東京外国語学校時代の書入を中心として〉，勝山稔編，《小説・芸術から見た海域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10），頁 260-263。此外，於森中美樹的研究中亦指出，此時期除東京外國語學校外，另有明治十三年（光緒六年，1880）成立的興亞會支那語學校，亦是以《紅樓夢》作為語言教材。

³ 參見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頁 14-33。

⁴ 參見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頁 45-47。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南開大學日語系博士論文，2015），頁 56-66

⁵ 如伊藤漱平，〈《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江戶幕府末年至現代〉、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胡文彬，《《紅樓夢》在國外》（北京：中華書局，1993）、張翔娜，〈《紅樓夢》在日本〉，《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八卷第 4 期（2008.12）等著作，均為將《紅樓夢》日譯本置於日本漢學與紅學的研究脈絡中進行史料性的整理與考察，且處理的

全面性地考察《紅樓夢》日譯本的譯者身分、底本選擇、翻譯形式的研究，目前僅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的博士論文，然其研究方法仍不脫離伊藤漱平與孫玉明二人以年代進行劃分歸納的模式，且由於涉及的譯本眾多，則對於個別譯本的分析難免有失之過簡的問題，而無從了解個別譯本的作用與在同一時代或同一譯本類型的共通性，因此關於《紅樓夢》日文譯本、尤其是節譯本⁶的研究，仍有待開展。

資料面向除譯本外，亦涉及日本關於《紅樓夢》的相關研究論著與評論，以建構日本紅學的發展歷程，而未專注於《紅樓夢》日譯本的翻譯情形、目的、流傳等效用。當前著眼於《紅樓夢》日譯本研究，僅宋丹的博士論文《〈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其研究方法大抵與伊藤漱平與孫玉明類似，均以年代分野進行歸納，以觀察政治與學術環境對於譯本的生成與詮釋。

至於對單一譯本的研究，如：丁瑞滢，《〈紅樓夢〉伊藤漱平日譯本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日·森中美樹，〈日本全譯《紅樓夢》的歷程簡述：平岡龍城《國譯紅樓夢》與白話翻譯〉，《華西語文學刊》2010年第2期（2010.11）、日·森中美樹，〈簡述日譯《紅樓夢》之難點：以平岡龍城《國譯紅樓夢》為例〉，《紅樓夢學刊》2011年第6輯（2011.11）、宋丹，〈井波陵一《紅樓夢》日譯策略芻議〉，《紅樓夢學刊》2018年第4輯（2018.7）、宋丹，〈試論《紅樓夢》日譯本的底本選擇模式：以國譯本和四種百二十回全譯本為中心〉，《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3輯（2015.5）等。以上這類研究論文的研究面向，或採主題式分析、譯本型態、譯本傳播等途徑，然其研究對象則不脫幸田露伴與平岡龍城的「國譯本」、松枝茂夫譯本、伊藤漱平譯本、飯塚朗譯本、井波陵一譯本等五種名家全譯本為核心，僅有少數如：日·船越達志，〈試論《紅樓夢》第12回在日本的早期傳播及對日本文人的影響〉，《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5輯（2008.9）是以節譯本為研究對象。由此可知目前對於《紅樓夢》日譯本的整體研究取向多以名家全譯本為核心。

⁶ 關於《紅樓夢》的譯本型態，崔溶澈分為：全譯本、節譯本、摘譯本、改譯本、轉譯本等五種，然對於各型態的定義解釋，僅以各國譯本進行介紹，並未詳加說明。然從行文可知，全譯本為針對脂本系統的八十回本或程本系統的百二十回本進行完整翻譯；節譯本為節選一至數回進行翻譯；摘譯本則不依據原文逐字翻譯，而是採取摘要式地略述梗概；改譯本則選取小說主要細節與主題進行翻譯；轉譯本則非以中文本為翻譯底本，而是以其他語言的譯本為底本的再次翻譯。參見韓·崔溶澈，〈《紅樓夢》翻譯本及其翻譯方法〉，徐志平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553-556。本論文對於譯本型態的分類與定義，即從此說。

目前所知的《紅樓夢》早期日譯本中，明確屬於教學用書、且譯文為獨立成文而非附於介紹文字之中者，唯宮崎繁吉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版之《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一書中的《紅樓夢》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之節譯。⁷此書所收錄的內容除《紅樓夢》外，另收有《水滸傳》、王實輔《西廂記》、《桃花扇》之節譯，⁸目前此書已由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掃描電子化，並可於資料庫「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內公開取得。然此本目前除宋丹的博士論文中簡要分析外，並未有專文深入討論，故本論文即以宮崎繁吉的譯本為研究對象，從其對《紅樓夢》的觀點與評價、選文理由、譯文型態進行分析，並延展至此譯本對於《紅樓夢》在翻譯、語言教學、文學教學等層面上的作用與特質進行分析，試圖了解此譯本於教學現場當中對於《紅樓夢》在日本流傳的功能性。

二、宮崎繁吉的《紅樓夢》研究與「經典化」現象

關於宮崎繁吉的生平與著作，據林以衡與宋丹的研究整理，可知其生於明治四年（1871）、卒於昭和八年（1933），字子寔，號來城、柳溪，為九州久留米藩士家族出身，漢學師從山下桃蹊、江崎巽菴等人，曾至中國及臺灣遊歷，並於早稻田大學擔任教師。學術性著作有《支那近世文學史》、〈論中國之傳奇〉、《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等，詩集《來城詩鈔》四卷，史傳作品則有《鄭成功》、《西施》、《楊貴妃》、

⁷ 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文本，均為宮崎繁吉於1905年由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之《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又此書曾於明治四十年（1907）再版，其內容大旨與1905年版無異，故本文仍以1905年版為主、1907年版為參照，故凡從1905版所引之內容，均於引文後標註頁碼，不另作註。

⁸ 宮崎繁吉對於中國小說與戲曲之節譯，除此四種外，尚有於明治四十年（1907）出版之《續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此書收錄《琵琶記》與《粉妝樓》兩種戲曲與小說的譯文，亦可做為宮崎繁吉對於中國小說與戲曲之翻譯與研究的參考對象。

《虞美人》，並有《俠文章》、《豪傑の雅量》、《豪傑の少時》、《豪傑の臨終》、《多情の豪傑》等書為日本歷史當中的豪俠立傳。⁹

其《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為其任職於早稻田大學時講義錄，從該書〈凡例〉可知，此書的著作原因是由於此前的日本漢學研究集中於對十三經、二十一史、漢魏唐宋的詩賦文章，而忽略了稗史小說與戲曲傳奇；然漢文學亦如日本文學善於寫情、且如西方文學長於敘事，且此點尤見於小說戲曲，因此欲經由對小說與戲曲的鈔釋，以使閱讀者能夠理解中國小說與戲曲的妙處。¹⁰在此基礎上，宮崎繁吉認為中國小說與戲曲自元代以降有長足的進步，也促成元、明、清三代的小說戲曲發展。其中最為傑出者，其認為當屬元代的《水滸傳》、《西廂記》、《琵琶記》，明代的《西遊記》與「玉茗堂四夢」，清代的《紅樓夢》、《兒女英雄傳》、《桃花扇傳奇》、《長生殿傳奇》最值得一讀，遂擇譯小說戲曲各兩種，即：《水滸傳》、《西廂記》、《紅樓夢》、《桃花扇》，擇譯此四種小說戲曲的原因在於，從不同時代的作品觀察語言變化、作者的獨特用法、文體差異，這些部分都是值得被注意的環節，故在元與清代的作品當中，選擇小說與戲曲每朝各一種以進行翻譯與解說。¹¹

此外，宮崎繁吉的小說戲曲選本的出現，實則是對明治時代以前的日本漢學界提出不同的觀點，故經由小說戲曲選本的編選，意圖使小說戲曲在日本漢學界不被重視的現狀達成價值翻轉的可能性，實已具備將中國古典小說與戲曲「經典化」(canonization)的功用、並藉此提高中國古典小說與戲曲在漢學研究範疇中的重要性。

宮崎繁吉編寫《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經典化效用，亦可參見其同時出版的《支那近世文學史》一書。在《支那近世文學史》中，宮崎繁吉並不採取作品成書時間進行先後排序介紹，而是依個人主觀認定的

⁹ 參見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第9期（2010.6），頁99-101。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頁63。

¹⁰ 參見日·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頁1。

¹¹ 同前註，頁2。

文本價值進行統攝，以此建立作品在該時期的代表性與重要性。如第五章〈清朝の小説及び戯曲〉第一節〈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及び其他の小説〉即以《紅樓夢》置於篇首，詳細介紹《紅樓夢》內容、創作背景、作者身分、後世續作等內容，至於《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鑑》、《花月痕》、《肉蒲團》、《野叟曝言》等其他作品，則簡要地敘述文本特色、並附於《紅樓夢》之後。¹²由此可見宮崎繁吉之認定《紅樓夢》在清代小說中的重要性。

然《支那近世文學史》中有關《紅樓夢》的文字，同見於《支那戯曲小説文鈔釋》中，並題為〈紅樓夢解題〉。相同的內容分別收於不同性質的著作中，則有其不同的意義：《支那近世文學史》從文學史的角度以進行時代性的涵蓋，藉此標舉出某一文本的重要性；《支那戯曲小説文鈔釋》則透過文學選本指陳該文本值得閱讀的之處於何處，而各篇選文前的解題則作為說明該文本的閱讀價值及其選文意義的引導，以此強化文本重要性。因此《支那近世文學史》與《支那戯曲小説文鈔釋》雖同為宮崎繁吉試圖將小説戯曲經典化的著作，對文本介紹的內容也一致，但由於兩部著作的目的不同，在進行小説戯曲經典化的途徑上也就因此產生差異。因此在考察宮崎繁吉在建構中國小説戯曲經典的過程中，應將其兩部著作的文字與編排情形相互對照，方可得到較完整的文本編選意義與價值。

至於宮崎繁吉透過《支那戯曲小説文鈔釋》將中國古典小説戯曲經典化的方法，則經由其對《支那戯曲小説文鈔釋》所收作品進行統整性的論述，廣泛地從作者身分考證、內容簡述、寫作要點、後世影響等層面建構出相關知識體系，以利讀者了解該作品的整體內容與重要性。此種論述與經典化的方法應用於其《紅樓夢》研究上亦然，如其即以「情」的寫作主旨進行說明：

¹² 參見日・宮崎繁吉，《支那近世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頁 302-312。

而後在榮國府中，一名當以「情塊」稱呼的貴公子賈寶玉出場，且有柳腰花顏的「情塊」，其中最為突出的薛寶釵、林黛玉、賈元春、探春、史湘雲、妙玉、賈迎春、惜春、王熙鳳、巧姐、李紈、秦可卿等十二名，即是所謂的「金陵十二釵」。更有數百名的男女在小說中出現，這些人彼此間的戀愛、執著、嫉妒、奸計等錯綜複雜的情事在小說中不斷地變化出現，並以極力描述榮國寧國二府的盛衰為能事。¹³（頁218-219）

此段文字以賈寶玉及十二釵為核心，表述《紅樓夢》中諸人均為「情塊」（即情的集合體）化身，且書中人物之錯綜複雜的情感亦涉及榮、寧二府由盛轉衰的過程。此「情塊」之論，又與甲戌本第一回夾批「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第一回眉批「自為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對於通靈寶玉自落情網之評，¹⁴第五回警幻仙子所說「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與情榜記述金陵十二釵未來命運的判詞涉及之「情／淫」之主題、及〈紅樓夢引子〉之「開闢宏蒙，誰為情種」，¹⁵第七回脂批稱「秦鐘」為「惜（情）種」之諧音¹⁶相互對照，不難看出《紅樓夢》從賈寶玉與十二釵以降諸人，皆是作為小說中各自的情欲的集合與具體呈現。而宮崎繁吉翻譯時是以王希廉評本為底本，¹⁷故宮崎繁吉雖閱讀過《紅樓夢》全書、卻未曾讀過脂批，其「情塊」之說又可與小說及脂

¹³ 「然る後ちに榮國府中の貴公子にして一個の情塊とも稱すべき賈寶玉を出し、柳腰花顏の情塊にして其尤も甚しきもの十二名、即ち所謂の金陵十二釵なる薛寶釵、林黛玉、賈元春、探春、史湘雲、妙玉、賈迎春、惜春、王熙鳳、巧姐、李紈、秦可卿を出し、更に數百の男女を出し、彼此の間に於ける情事を錯綜し、戀愛、執着、嫉妬、奸計など、ありとあらゆる變化を寫して條條數百に涉りながら、能く榮國寧國二府の盛衰を敘述し、」

¹⁴ 參見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5。

¹⁵ 參見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84-93。

¹⁶ 「方知他學名喚秦鐘。」王府本脂批：「設云惜種」。有正本脂批：「設云情種」。參見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172。

¹⁷ 參見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頁63-64。

批的「情種」喻《紅樓夢》所寫諸人均為「情之聚合體」暗合，因此宮崎繁吉稱書中諸人皆為情塊，並以此貫穿小說主軸，有其洞見。

除對《紅樓夢》的「情」之主軸加以描述外，宮崎繁吉亦對《紅樓夢》的敘事結構與文字技巧有所評論：

《紅樓夢》的結構著實極為宏大複雜，在現今的一百二十回中進行檢索，其中出現的人物，男性有二百三十五名、女性有三百三十三名，合計有五百四十八名之數。加之其對賈府內事描寫入微，其格局就愈為複雜，我國讀者若不了解中國的風俗民情，則閱讀時難免有多歧亡羊之感、並生出倦怠之意。如能翫味其中的內容，區分人物彼此的差異，自可發現人物彼此分明、且一一活躍於紙上，全無無用之人。由此點來看，我可斷言作者的才華非比尋常，且其文字絢爛如花，令讀者為之目眩。¹⁸（頁219）

在此段中，針對《紅樓夢》的宏大結構與涉及的眾多人物著眼，認為在如此龐大的人數當中，加之對於賈府中事描寫得極為入細，對不熟悉中國習俗的外國人而言，難免會對異文化產生困惑、並陷入其複雜的情節中，使閱讀時不免產生倦怠之意。

¹⁸ 「紅樓夢の結構は、誠に宏大にして複雑を極めておる、今其一百二十回に涉りて之れを檢するに、其人物を出すにしても男子ばかりで二百三十五名ある、女子ばかりで三百十三名ある、併せて四百四十八名と數へらるゝに至りてはだすとも出したもの、之れに加ふるに其筆は能く府中の内事を寫して細に入り微に入りおる處が非常に多いから、其局而は愈よ煩雜に流されて、邦人の未だ嘗て彼の土の習俗事情に通じてゐないものが一寸之れを讀んだばかりでは甚だ多歧亡羊のおもひを為し、多少倦怠の意を生ずることを免れぬのであるが、猶ほ能く翫味すれば、彼れは彼れ、此れは此れと、彼此の間自ら分明にして一一活躍し、殆んど無用の人物がないやうにおもはるゝ、故に余は此點よりして尤も其作者の才筆の尋常一樣ではないことを斷言する、而して其文字は絢爛にして花の如し、讀者の眼も為めに眩む計。」案：在此段中的《紅樓夢》出場人數計算，宮崎繁吉稱男有 235 人、女有 313，合計為 448 人，此處合計的人數計算有誤，當為 548 人，此錯誤於《支那戲曲小説文鈔釋》1907 年之再版中已有修正。筆者自譯中的合計人數乃據此改訂。

誠如宮崎繁吉所述，書中人物之多、事件描寫之細，乃至於物件種類與價值，在《紅樓夢》中歷歷可見，如姚燮《讀紅樓夢綱領》所言，不僅人物死因多樣，且下人名冊、所領月銀、賈府日常開銷的打點物件及花費、封賞之隆、年節之禮，於書中亦清楚列舉。¹⁹此種寫作方式足使讀者在此當中日眩神迷，對於不熟悉中國文化的外國讀者而言，此種描寫無疑增加閱讀的困難性。且涉及的人物之多，易使外國讀者無法精準的判斷出每一個人物的身分、性格特質、以及在小說當中的作用，更不利於記憶人物的名字與在小說當中的親屬關係及情節上的功用，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混亂，故此指陳外國讀者在閱讀《紅樓夢》時的難處。儘管如此，宮崎繁吉仍然試圖將《紅樓夢》引介給日本讀者，並於下文道出如能細細玩味小說內容，則可以發現小說人物塑造與文字技巧等藝術性。

除此之外，宮崎繁吉亦對《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作者身分進行討論。在宮崎繁吉之前，日本最早進行討論《紅樓夢》作者身分的人，當屬森槐南。其於〈紅樓夢評論〉中，不僅對曹雪芹的家世進行考證，同時從張問陶的《船山詩草》所收之〈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思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作者是否為同一人。然在其推論中，從《紅樓夢》的傳播與文字整體感覺，認為《紅樓夢》百二十回應是出於同一人之手，並駁斥「高鶚續書說」。雖然森槐南對《紅樓夢》作者身分的討論是持「百二十回本俱曹雪芹所作」之論，但其觀點在今之研究成果看來，並不完全正確，但是對於日本在研究《紅樓夢》的作者身分一事上，森槐南在有限的資料中仍試圖進行推斷，並分析《紅樓夢》的悲劇意識與文學美感等方面的成就，因此對於日本紅學研究而言，雖在作者考證上的推論並非完全正確，但總體而言，仍有其開創性。²⁰

¹⁹ 參見清·姚燮，〈讀紅樓夢綱領〉，一粟編，《紅樓夢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164-166。

²⁰ 參見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頁23-34。

宮崎繁吉在進行《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作者身分的推論上，所依據的文獻亦為張問陶的詩作與程偉元〈紅樓夢序〉，但在觀點上，對於當時通行的「《紅樓夢》百二十回俱出於曹雪芹之手」一說雖有懷疑，但又由於除張問陶之說外，並無其他證據可以證明高鶚曾續作後四十回，故姑存此說。此外，又依據程偉元〈序〉之文字，認為程偉元之前或許有百二十回的目錄存在、卻僅八十回本在市面上流通。至於後四十回的散逸原因，則認為可能是程偉元在續成後四十回後所製造出的說法；但其亦認為另有一種可能是，原有百二十回的腹稿，但因為作者死亡、或出於其他原因而未能完成，並由朋友或後人依據腹稿代為續成後四十回。因此可見，宮崎繁吉已注意到《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作者可能不同的問題，並提出數種假說，雖然缺乏其他的資料可以證明此說的正確性，但這種說法的提出，仍對於日本當時通行的「百二十回俱出自曹雪芹」的觀點有所檢討。²¹

宮崎繁吉提出此說，雖無其他資料可以證實，卻對於《紅樓夢》的成書與作者身分試圖提出個人觀點，且此觀點無論是在日本、或是中國都具有前瞻性。原因在於：宮崎繁吉提出的論點，與十六年後、1921年時胡適所寫的〈紅樓夢考證〉相較，觀點上並無太多差異。唯宮崎繁吉對於「俱為曹雪芹作」之說雖有懷疑、但對於「高鶚續書」一說亦有所猶疑，仍大抵認為後四十回非出於曹雪芹之手。而胡適的考證，從俞樾的《小浮梅閑話》中的《紅樓夢》考證，以及小說內容進行前後對照，發現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的預想設定上有所不合，故此確定後四十回出於高鶚之手。²²由此觀之，宮崎繁吉的論點有其前瞻性，雖然未能如胡適的考證般詳實且堅定，然在提出時間上，宮崎繁吉確實較早，且在資料相對不足的情形下，得以推論後四十回的作者身分的各種可能性，同

²¹ 關於宮崎繁吉對《紅樓夢》作者身分問題的討論，可參見《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頁 220-221。

²² 參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150-157。

時延展出清中葉以來的《紅樓夢》續書現象，後文更從小說內容推測《紅樓夢》是對「滿州出身的某宰相府中事之影射諷刺」、並由此指出《紅樓夢》曾遭燬禁的可能原因。²³因此無論是在《紅樓夢》作者身分的考證、續仿之書的創作、並以索隱的角度推測《紅樓夢》的內容影射與遭禁原因，已足見其觀點的創新，同時標示出日本紅學研究上的進展。

因此宮崎繁吉的〈紅樓夢解題〉，篇幅雖不長，但涵涉了紅學研究的諸多面向，且在當時資料不足的情形下，仍可提出其個人具有前瞻性的觀點，由此可見其《紅樓夢》研究成果有其廣度與深度，且此成果應用於教學上，亦有奠基知識的價值所在，使讀者了解《紅樓夢》的相關知識、從而體察《紅樓夢》在中國小說界的重要性，以此提高《紅樓夢》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漢學界中的地位。

三、節譯「劉姥姥一入榮國府」的可能性考察

宮崎繁吉的《紅樓夢》翻譯，選擇第六回「劉姥姥一入榮國府」事為翻譯對象，並從天將破曉、劉姥姥帶板兒入城一段譯起。但宮崎繁吉何以選譯此事，〈紅樓夢解題〉云：

其第四回（案：當為第六回）的「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即是以劉老老此一農婦前往尋求當時在榮國府中享受一世榮華富貴的王夫人為主題。此回的筆法未必是全書中最妙之處，但從鄉下人觀看服食鋪陳之盛，並將貴族的生活光景巧妙地描繪而出，必有其一讀的價值。²⁴（頁224）

²³ 參見日・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説文鈔釋》，頁221-223。

²⁴ 「其第四回にして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即ち劉老老と稱する田舎出の一老婆が當時一世の榮華を専らにしてゐる榮國府中の王夫人を尋ぬるといふ一節で、此一節の筆墨は必ずしも全篇中の最妙處といふではないが、服食敷陳の盛を觀て驚歎する田舎ものと、朱門の富貴榮華なる光景とを把りて巧みに寫生してゐるから、必ず一讀の値があるとおもふ、」

對於第六回的文字內容，宮崎繁吉認為此回雖未必是全書最妙的一回，但是在此回中，從一鄉下老婦的視角對貴族生活的榮華富貴光景及驚歎描寫得極為細緻，因此仍有一讀的價值。從此段簡短的文字當中，已明確指出了第六回的寫作核心，並透露出《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選擇此回為翻譯對象的理由：其一為從生活細節描述賈府的榮華富貴，其次則是由劉姥姥的視角進行觀看，以反襯出身階級的差距。

然而在選段內容上，宮崎繁吉並未從王狗兒父祖輩與王家的連宗關係開始翻譯，而是選從劉姥姥在天將破曉時、帶著板兒入城一段開始譯起，至於王狗兒與王家的關係，則是在〈紅樓夢解題〉中略述王狗兒的家庭背景與性格、劉姥姥與王狗兒討論是否要入賈府尋求協助等事。此外，此回除了「劉姥姥一進榮國府」外，尚有篇首略寫的「賈寶玉初試雲雨情」一段，但此內容在〈紅樓夢解題〉中則隻字未談，可能的原因在於：此段是延續第五回對「淫」的詮釋與性事啟蒙而來，故應視為第五回的遺緒，至劉姥姥一入榮府方為新情節的開展。

再者，第五回與第六回的不同主題與故事轉折，前人已有論述，如張新之稱：

但書方第六回，要緊人物未見者正多，且於寶玉初試雲雨之次，恰該放口談情，而乃重頓特提，必在此人，又源源本本，敘親敘族，歷及數代，因而疑轉甚。²⁵

如其所言，第六回之開頭述賈寶玉初嘗性事，且第五回又述及寶玉在太虛幻境的性事啟蒙，因此第六回本應延伸此內容，對於「情／淫」進行深化。但《紅樓夢》卻轉而描述連宗的外戚，對於王狗兒一家的親族淵源與當下處境深入描寫，再推展至劉姥姥初入賈府，見賈府之榮華，一則與第六回之俗諺「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有所呼應，以襯托出貧富之間的不同生活情景之對照；二則是為了將賈府的興衰過程經由村婦之眼得到證實；三則是從劉姥姥入賈府，漸次引出賈府中的幾名重要人

²⁵ 參見清·張新之，〈紅樓夢讀法〉，一粟編，《紅樓夢卷》，頁157。

物，並從應對過程中連結劉姥姥與賈府諸人的關係。且如第二回之脂批所言：「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敘出榮府，然後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²⁶雖此語通用於小說中所有的外姓親戚，然劉姥姥一家與賈府並無血緣關係，僅為名義上的外戚，也正因為劉姥姥與賈府關係的疏遠，方可為小說情節預留伏筆，留下建立親密關係的可能性。是以第六回所設下的伏筆若應用於教學上，則可從劉姥姥的視角映照出整本《紅樓夢》的情節開展與賈府興衰轉變的歷程，以及劉姥姥在這當中的重要性。

以劉姥姥在小說中的作用而言，張新之曾評為：「閑人初讀《石頭記》，見寫一劉老老，以為插科打諢，如戲中之丑角，使全書不寂寞設也。」²⁷然在第六回時，此「插科打諢」的性質僅在初入榮府時的好奇與侷促、以及與王熙鳳交談時隨口說出的俗語等事上隱約可見，真正的丑角特質，則須至第三十九、四十回時方可大現異彩。因此第六回的作用，當如甲戌本夾批所稱的「是數十回後之正脈也。真千里伏線」²⁸為小說後續情節發展暗藏伏筆的功能，也因此張新之評為「於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²⁹亦著重於第六回的伏筆。

此「千里伏線」的表現，如甲戌本回目後批云：「且伏二進及巧姐之歸著」（靖藏本作「且伏二進三進巧姐歸著」），³⁰王府本夾批稱：「不知不覺先到大姐寢室，豈非有緣」³¹等語。歐麗娟則從劉姥姥的「母神性質」轉化歷程，指出劉姥姥從「求救者」逐漸轉變為「道謝者」與

²⁶ 參見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5-36。

²⁷ 參見清·張新之，〈紅樓夢讀法〉，頁 157。

²⁸ 參見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140。

²⁹ 參見清·張新之，〈紅樓夢讀法〉，頁 157。

³⁰ 參見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138。

³¹ 同前註，頁 148。

「救世者」的過程，認為劉姥姥入賈府之事乃是使小說成為有系統性的神話性結構之伏筆。³²

然不論是「求救者」、「道謝者」或「救世者」，劉姥姥總不脫離「見證者」此一身分。如將第十六回元春封妃、第三十一回翠縷稱賈府的石榴樓子花為「樓子頭上起樓子」³³，此一隱含著賈府在元春封妃時，家勢為「富貴加貴」、而至鼎盛的階段。³⁴因此以第十六回的「盛極」為分界，此前則是「加盛」的階段、其後則將逐漸「轉衰」。故劉姥姥一入榮府是賈府即將富貴加貴、盛上加盛的時期，二入榮府則為賈府的極盛期，三入榮府則是賈府的衰敗期，故三次入府，見證了賈府聲勢的不同階段，因此將劉姥姥的「見證者」身分作為貫穿全《紅樓夢》的富貴夢醒之發展，則未嘗不可。且劉姥姥三次入榮府，不僅主題性明確、且可將所有伏筆連貫、寓意彰顯，³⁵因此在故事情節上，劉姥姥故事亦可視為完整的主題結構，且可將《紅樓夢》中的賈府興衰過程，經由劉姥姥的視角化為縮影，由此具體而微地呈現《紅樓夢》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³² 參見歐麗娟，《大觀紅樓·母神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498-503。

³³ 參見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頁 491。

³⁴ 歐麗娟即從石榴花為賈元春的象徵物，且從《紅樓夢》中「人花合一」的象徵作用，將三十一回晚開的石榴樓子花比擬為賈府的聲勢來到鼎盛。但此鼎盛雖為「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勢，卻是賈府傾頹前的奮力一搏與迴光返照，最終仍將迎來崩解。因此元春封妃，是盛極轉衰的關鍵象徵時刻。參見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石榴花」：賈元春新論〉，《紅樓夢人物立體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頁 264-277。

³⁵ 如甲戌本第六回之回目後批云：「此回借劉媪，卻是寫阿鳳正傳，並非泛文」，王希廉評第五回為「一部《紅樓夢》之綱領」，而第六回接於其後，則是為講述王熙鳳弄權之「造孽開端，實起於寧」，以諭示榮寧二府之敗徵。且小說第五回，警幻道出榮寧二公之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遂以金陵十二釵之終身冊與《紅樓夢曲》作為警示。因此從第五回與第六回的關聯性而言，第五回為全書綱領，而第六回則是經由富貴的表象，逐步將情節引導至高峰，而暗藏其後的賈府衰頹之兆。參見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頁 89。清·王希廉，〈紅樓夢總評〉，頁 146。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138。

雖然未能得知宮崎繁吉在講述《紅樓夢》時，如何經由《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與《支那近世文學史》說明《紅樓夢》的整體發展。但其以第六回作為翻譯與教學的選文對象，則預留了經過劉姥姥一入榮府做為開端，且能夠漸次引導學生與其他普遍讀者對於《紅樓夢》後續情節發展的閱讀興趣，讓閱讀者能夠隨著劉姥姥入賈府的視點，從而能夠了解賈府興衰轉變的歷程，並將「世情小說」對於人情百態的寫作特性加以提點，引起讀者閱讀《紅樓夢》的興趣。

此外，宮崎繁吉以第六回作為講述文本，如可間接引導出二入與三入榮府之事，則不僅能夠從宏觀視野觀察《紅樓夢》，亦可讓劉姥姥在二入榮府的「丑角性格」、與三入榮府的「救世者」的不同性質得以被彰顯。因此如涂瀛〈劉老老贊〉云：

劉老老深觀世務，歷練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餘技作遊戲法，如登傀儡場，忽而星娥月姐，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癡人說夢，忽而老吏斷獄，喜笑怒罵，無不動中竅要，會如人意。因發諸金帛以歸，視鳳姐輩真兒戲也。而卒能脫巧姐於難，是又非無真肝膽、真血氣、真性情者。殆點而俠者，其諸彈鋏之傑者與！³⁶

此論贊將劉姥姥的性格、與三入賈府的內在精神有所統整，指出劉姥姥深明世務、性格詼諧、且兼有救人於難的真性情等性格特徵。因此譯文以第六回作為起點，且為教學講述的開端，實隱藏了經由劉姥姥故事統整《紅樓夢》全書發展大要的功能，且可免去眾多的人物與事件鋪陳、亦能避免語言隔閡對韻文所諭示的家族及人物命運等可能減低外國讀者閱讀《紅樓夢》興趣的因素。

除可從劉姥姥貫穿《紅樓夢》全書的作用來看宮崎繁吉的選文原因，亦可從《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共通選文現象進行分析。此共通現象為：以一個主要人物做為中心，輻射並連結其他人物，以此烘托出

³⁶ 參見清·涂瀛，〈紅樓夢論贊〉，一粟編，《紅樓夢卷》，頁136。

主要人物的形象，並架構出整體情節。以《紅樓夢》為例，第六回是以劉姥姥為核心，連結周瑞家的與王熙鳳間的關係，並兼及板兒、平兒、賈蓉等人，以突顯出劉姥姥為了求援的主題、以及富者與貧者在生活情狀上的差距，做為對賈府富貴生活的揭露。

觀《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其他三篇，亦有類似的現象：《水滸傳》選第四回「魯智深大鬧五台山」，以魯智深為核心，其關聯的人物則是五台山寺的住持、打鐵匠與酒肆主人，兼及其餘僧眾與過客，以此建構出魯智深的魯莽性格並不受到住持的教化而有所改變；《西廂記》選第三本〈張君瑞害相思〉之第二折，以紅娘傳信為中心，貫穿崔鶯鶯與張君瑞兩人之間，以引發崔、張兩人之間對情感的渴求與身分不對等的焦慮，並進一步促成姻緣；《桃花扇》選第二十三齣〈寄扇〉，以李香君為主要人物，關聯楊文驄與蘇崑生，並於開場中述及侯方域，李香君取扇相思，見扇上的血點引起愁緒而黯然睡去，醒後見楊文驄與蘇崑生將血跡點綴為桃花，遂感紅顏薄命，藉此敘述李香君對侯方域的相思愁緒。

因此從四篇選文當中，可以發現宮崎繁吉所選的內容都是以一人一主題為核心，且經由主要人物與其他人物的相處中，以明確突出文章所欲表達的主題。且在四篇選文當中，人物的主、副關係極為明確，則更讓外國讀者能夠明確判斷出故事當中的情節推動是以何人為中心，而不至於在龐大的敘事結構與眾多的人物之間有所迷失。

從此點檢視《紅樓夢》，宮崎繁吉已在〈紅樓夢解題〉中明確指出《紅樓夢》中出現的人物有548人，且小說擅長描寫生活種種細節，因此對不熟悉的外國讀者而言，容易迷失在人名的判斷、人物間的關係、小說的布局結構中，進而喪失閱讀興趣。而選「劉姥姥一入榮府」事，且刪去前述的王狗兒家與金陵王家的連宗關係，亦是避免了出場人物增加、與兩家的因果關係可能造成情節更為曲折，因此從劉姥姥天亮入京開始翻譯，則明確是以劉姥姥為主軸，藉以表述當前困難、在賈府中見到的一切榮華富貴，至於連宗「略有瓜葛」一事，亦可經由王熙鳳與

周瑞家的之間的對話中簡略帶過，成為小說情節的輔助說明，不致產生空缺。

此外，其選文標準不能僅從「人物精簡」一項進行推論，必須與「情節鋪陳單純」互相搭配。若僅以主要人物貫穿單元故事主題，以達成「人物精簡」的目標，則《紅樓夢》中亦有許多單元故事可成為宮崎繁吉可能的選文對象，如尤二姐與尤三姐故事，都具備此種特徵，但二尤故事均是從六十三回「死金丹獨艷理親喪」事為引，尤三姐故事至六十六回告終、尤二姐故事則至六十九回方結，整體情節鋪敘過長、涉及人物眾多，則難以達成鋪陳單純與人物精簡的目標。又如「劉姥姥二入榮府」事，雖仍以劉姥姥為核心，但涉及人物較之一入榮府則多出數倍，縱選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而略去第三十九回的謝恩一事，雖則情節單純且熱鬧活潑，但出現的人物仍多，對於初接觸《紅樓夢》的外國讀者而言，尚需分清人名、親屬與主僕關係，應用於文學推廣與教學層面而言，在宮崎繁吉對《紅樓夢》的介紹與文本須面對讀者的身分及興趣等層面的考量下，亦非合適之選。故從宮崎繁吉的選文現象，或可推斷出其主要的選文標準當為「人物精簡」與「情節鋪陳單純」兩項，以便於對日本讀者進行介紹。

再者，宮崎繁吉選擇第六回，而非如其之前的譯者多選擇具有韻文的段落。³⁷未如此選擇的原因，或為《紅樓夢》之韻文涉及了作者的創作概念與小說人物的當下心境與未來命運，然不論是何者，如無相對應的情節以茲對照，縱將韻文譯出，亦無從使讀者了解《紅樓夢》作者如何安排韻文於小說行文中，作為後續情節的伏筆，而僅能讓讀者經由翻

³⁷ 依宋丹之整理，在宮崎繁吉以前的譯者與選文如下：（1）森槐南〈紅樓夢序詞〉（1892），選第一回楔子；（2）島崎藤村〈紅樓夢的一節：風月寶鑑之辭〉（1892），選第十二回「賈天祥正照風月鑑」一段；（3）笹川臨風《支那小說戲曲小史》（1896），選第一回開頭與第一百二十回末尾；（4）長井金風《文章講義》第 18 號（1903），選第四十五回「風雨夕悶製風雨詞」一段。其中除島崎藤村之翻譯不涉及韻文外，其餘均有韻文。參見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頁 319。

譯欣賞中國詩詞之美。故宮崎繁吉在教學時捨棄具備《紅樓夢》全書大要的第一回、或暗藏人物命運的第五回，應是考量整部《紅樓夢》的富貴無常之旨與對後續情節的連貫性與整體性，同時為便於使讀者接受，方選擇第六回為翻譯對象。

綜前所論，宮崎繁吉之所以選擇「劉姥姥一入榮國府」為翻譯對象，除有其關注的此回寫作特點外，若從選本編撰並應用於教學現場的角度論，或也指出了劉姥姥故事在講述《紅樓夢》時的一種切入角度，既便於教師貫穿全書發展、又利於學生在趣味情節中獲得相關知識，且不被龐大的敘事結構與人物關係迷惑，強化「劉姥姥一入榮國府」故事在教學應用上可能引起的諸多效益。

四、讀者考量取向的翻譯策略與特徵

宮崎繁吉之譯「劉姥姥一入榮國府」，是從劉姥姥於天未明時開始著手準備進城事宜為起點，於王熙鳳手中得到資助後、與周瑞家的道謝與告別為終，當中又依其己意精分為43小段（詳見文末附錄之表），並採取漢文與日文的逐段對譯模式，並標有「字解」以解釋文句、或是對中國特殊的物件風俗等特殊詞彙加以介紹；標「義解」以譯出各段的白話譯文。除此之外，於部分段落的義解之後，亦附有個人的見解以進行評點。其翻譯方式，則是採取傳統的「漢文訓讀」模式，³⁸於正文中標記訓點，以作為其對於漢文的理解與翻譯的依據。

³⁸ 本文所指的「訓讀」，皆指漢文的「訓讀」（くんどく），而非漢字的「訓讀」（くんよみ），二者雖皆可譯為「訓讀」，但前者是一種翻譯方式，主要牽涉語順與文法；後者則是指日本本有的讀音，而與文法無涉。至於「漢文訓讀」的定義為：「藉由返點對古典中文的語順轉換為日語的語順，以及對日語語句的音讀與訓讀進行標記的讀解方式，即為漢文訓讀。」是作為東亞漢字圈（特別是日本與韓國）在對閱讀漢文時，所使用的理解方式。參見（日）古田島洋介、湯城吉信，《漢文訓讀入門》（東京：明治書院，2011），頁8。

漢文訓讀作為一種翻譯方式，為日本進行漢學教育與漢文閱讀時常見的理解途徑，此種翻譯方式仍常應用於教育現場中，因此宮崎繁吉使用漢文訓讀翻譯《紅樓夢》、再轉化為白話文體，本無特殊之處。然若綜觀《紅樓夢》日譯的歷史，宮崎繁吉的先訓讀、後再轉化為白話翻譯，同時採取逐段對照的翻譯模式，則為《紅樓夢》諸多日譯本中少見的型態。

依宋丹的研究，《紅樓夢》日譯本中不乏有在白話文體中參雜訓讀痕跡的譯著，如松枝茂夫譯本、伊藤漱平譯本、飯塚朗譯本、堺行夫譯本等；亦有明確可見以訓讀作為翻譯手段的譯著，如晚於宮崎繁吉譯本之平岡龍城與幸田露伴共譯的國譯本《國譯漢文大成·紅樓夢》及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選文。無論是訓讀體的殘留或是直接可見訓讀模式，均可見部分《紅樓夢》日文譯者採取此種傳統方式進行翻譯。除此之外，則另有部分譯本於今只見純白話譯文，而難以判讀是否曾先訓讀、後再轉譯為白話譯文。³⁹在這些譯本當中，採原文與譯文對譯者，則存宮崎繁吉譯本、國譯本、神谷衡平譯本等三種，且三者雖同採原文與譯文可相對照的對譯模式，國譯本是將原文置於每冊譯文之後、宮崎繁吉譯本與神谷衡平譯本則採逐段對照，以閱讀參照的便利性而言，宮崎繁吉譯本與神谷衡平則明顯優於國譯本。至於在語言使用上，宮崎繁吉之譯法為在原文上標註訓點（くんでん），直接譯出白話譯文，不再標記漢文訓讀體（書き下し文，かきくだしぶん）；國譯本則是以漢文訓讀體為基礎、在口語對話中兼採白話文體；神谷衡平譯本的編排形式則無從讓人辨析是否曾經過訓讀已進行翻譯。撇除神谷衡平譯本，宮崎繁吉譯本與國譯本的翻譯語言使用，雖均可令讀者了解作品涵義，但國譯本的採用漢文訓讀體的翻譯語言，雖保留了原文詞彙，卻難免令讀者感到生硬，而產生閱讀心理上的隔閡，不若宮崎繁吉之使用白話文體進行翻譯、漢文訓讀是作為文法參照的方式更貼近讀者的閱讀心理。⁴⁰

³⁹ 有關《紅樓夢》日譯本之以訓讀作為翻譯方式的判讀，可參見宋丹的博士論文《〈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對每一個譯本的分析。

⁴⁰ 誠如藍弘岳所言，漢文訓讀所使用的日語語彙是特定且帶有古風的日語，

此種譯本內容編排及語言使用的形式，或可從《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預設讀者身分進行推斷。由於此書是由早稻田大學出版、伊藤漱平又稱此書為宮崎繁吉教學時的講義錄，⁴¹從譯者身分與出版單位觀之，此書的主要閱讀群體應為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但若參照〈凡例〉的內容，並未明確指出其預設的讀者群，而是希望閱讀者能夠從當時日本文壇關注的中國詩文等作品、轉而關注與欣賞戲曲與小說，並理解小說戲曲此種文學作品在敘事與抒情上的成就，因此從〈凡例〉的內容觀之，宮崎繁吉所欲對話的對象，除了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外，亦可能包含當時日本的普通讀者。⁴²而無論此書是應用於文學教育現場、或是在文學推廣上，宮崎繁吉採用逐段對譯的白話文體進行翻譯、且翻譯語言不受到漢文訓讀體的牽制，無論是在編排上的便於對照、或是翻譯語言的易於接受，應是宮崎繁吉考量在教學與文學推廣之後所採取的翻譯與編纂策略，使《紅樓夢》有機會受到學生與廣泛讀者群體的接受。

宮崎繁吉的翻譯語言與內容理解上，大抵符合原文所述。然其進行翻譯時，在部分細節上考量了語言文化的對應，以進行調整。如翻譯俗語時，宮崎繁吉視日語中是否有可與漢語相對應的俗語而採取不同的翻譯方法，「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爾老拔

且訓讀閱讀漢文時必須按照日語的聲音與語法規則來唸，因此漢文訓讀的日文化會給人有嚴肅的語感。再則，經由訓讀之後雖可了解文意，但難免會失去理解漢文文義中微妙語意之別的機會，因此訓讀作為一種翻譯手段與表達方法，雖然會在原有的日語語法中影響對漢語語法的了解，但也由於訓讀對文法結構的重視，則會減少閱讀過程中對漢文誤解的可能性，因此閱讀者在有一定的自覺與理解上，仍可在文法的文意理解上，體會漢語語法及日語語法上的表達差異。參見藍弘岳，〈荻生徂徠的漢文學習方法論：訓讀與「譯學」〉，《翻譯與跨文化流動：知識建構、文本與文體的傳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頁 101-102、109-110。

⁴¹ 如伊藤漱平即認為《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為宮崎繁吉在早稻田大學任教時所撰寫、並編輯而成的講義錄。參見日·伊藤漱平，〈《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江戶幕府末年至現代〉，頁 467。

⁴² 伊藤漱平稱宮崎繁吉經由《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將接觸《紅樓夢》及其他戲曲小說等作品的機會講述給全國的聽講者，因此具備重大的意義。參前揭文。

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壯」等語，均採字面上的口語直譯；⁴³但如劉姥姥甫至賈府門前時，見到賈府下人「挺胸凸肚」的樣態，譯為「鳩胸然と胸を突出し、布袋然と腹をふくらし」，採取具體之物的比擬，以顯示出下人的形貌；或如「說東談西」譯為「四方山の話をしてゐる」，其中「四方山話」則為「各種世間之話」之意。凡此種種，均為利用日語中習用的字句對原文進行詮釋，使讀者能夠從慣用語中對小說人物的形貌與性格有所了解。

因此在翻譯的語言模式上，宮崎繁吉在基於漢文訓讀體的理解上，採取的是直譯的翻譯形式，但不全然依據漢文訓讀體的體例直接轉換為現代譯文，而是採取更口語的直譯對《紅樓夢》進行翻譯，使語言更為自然，且又隨小說情境的變化及語言的能否對應，採取較靈活的變化，使譯文不致受到原文與漢文訓讀體的限制。⁴⁴由此觀察宮崎繁吉翻譯語言的使用，是以直譯為基礎、但又對於人物的內在情感與表現進行思考，於是在部分語句上進行延伸補充，使閱讀者能夠更為了解小說人物的情感表現。

而宮崎繁吉採用此種翻譯策略的原因，應為可使學生能夠以現代日文為基礎，了解《紅樓夢》第六回的內容，並進一步從譯文轉而對原文產生閱讀興趣，從而能夠直接閱讀小說原文、且不受語言轉換上的隔閡，因此採用直譯，是為了讓學生能夠在文句的對照上進行理解，以減少閱讀困難。且伊藤漱平又認為此書讓全國讀者都有接觸到《紅樓夢》

⁴³ 如「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譯為「朝廷でさへ三軒の貧乏な親類はある」；「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譯為「瘦せ切れて死んだ駱駝でも馬に較ぶれば矢張り大きい」；「爾老拔一根汗毛，比我們的腰還壯」譯為「貴女様のお抜きに為つた一本の汗の穴の毛は、私どもの腰に比べまして矢張り強ふ」，此三句俗語之譯，均為依據原文字面內容進行直譯。

⁴⁴ 此種翻譯方式，或可以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之「再創造翻譯」（re-creative translation）與「文學翻譯」（literary translation）進行詮釋。其稱「再創造翻譯」，即將原文的言外之意或潛文本（sub-text）翻譯出來；「文學翻譯」則講求較原文更為口語、自然的翻譯形式，而選用本土慣用的語言，卻會和原文內容大相逕庭。參見捷克·Peter Newmark 著，賴慈芸編譯，《翻譯教程》（臺北：臺灣培生教育出版社，2005），頁 88-91、97-98。

等中國戲曲小說的機會，雖然此「全國讀者」的身分包含極廣，無從得知是否可再對此讀者群進行細分，亦不可知此說的提出理由為何。倘若真如伊藤漱平所說，此書在教學上又欲擴展至全日本的普通讀者，那麼語言的使用若全然採取直譯，雖然可維持小說的原貌，但也難免喪失語言的通俗性、亦減弱讀者的閱讀興趣，因此日文口語及俗語的使用，則是為了符合普遍讀者的閱讀需求，以符合日常使用的語言，讓閱讀者能夠領會《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塑造。因此從翻譯語言的使用進行觀察，宮崎繁吉的翻譯語言模式，在「文學性」與「教學性」作為基礎，並考量文學流通的「通俗性」，使中國文學作品能夠在日本社會中流傳、並不局限於教學場域中，因此伊藤漱平對宮崎繁吉譯本作用性的推論，有其合理性。

然而，宮崎繁吉的翻譯語言雖是口語，卻較為文雅，則難免使人物身分與形象無從被區分。如在第六回中，出現的重要人物為劉姥姥、周瑞家的、王熙鳳、賈蓉，若依身分進行分類，又可區分為「村婦」、「有頭臉的家僕」、「貴族」，從此分類上細究，《紅樓夢》中的人物語言使用，會依身分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使不同人物的形象塑造不致混淆。此種經由人物語言的形象塑造，即為小說家對「聲腔」(voices)的操縱，讓人物能夠經由「對話體」的敘事文學當中，以符合各自的階級、性別、職業等性質的詞彙來說話，以造成小說的「眾聲喧嘩」，讓不同人物的不同語言，展現出各自的思想與立場，同時使人物形象風格化。⁴⁵然而，在宮崎繁吉的譯文中，對於劉姥姥的語言使用，並未依照其村婦的身分有所改動，而是與賈府諸人採取相同的語言。如劉姥姥初至賈府時對守門人行禮時的話語，譯為「旦那様がた御機嫌宜しふ御坐り」(頁228)，請求門房協助引見周瑞家的語句則為「周の旦那を尋ぬる者で御坐りますが、御手数恐れ入りますが」(頁230)，得見周瑞家的時的問好則譯為「御機嫌よろしう」(頁233)，向王熙鳳問安時，則說

⁴⁵ 參見英·David Lodge 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06)，頁173-175。

「奥様御機嫌よろしふ御座ります」（頁258）。以上諸語，所用的語言均為較高級且文雅的敬體，與周瑞家的此種有身分的家僕、及王熙鳳的貴族身份所使用的語言均無差異，誠然劉姥姥入賈府是有求而來，因此語言應在符合禮節的情形下使用一般性的敬語即可。但在宮崎繁吉的譯文中，卻一律譯為高級且文雅的敬體，然劉姥姥身為一名村婦，使用此語雖合乎禮節、卻與其身分不合；縱需使用，對有身分差距的王熙鳳、或是有交情且身分高於其他僕婢的周瑞家的尚且合宜，但對於賈府門房亦同用文雅的敬語，則無從區別小說中劉姥姥的身分、及其對待不同身分的人時的語言差異。因此在人物語言的翻譯上，宮崎繁吉雖是遵循字面進行翻譯，卻失去了小說作者對不同人物在語言風格上的塑造。

且宮崎繁吉對特殊名物的在翻譯，也存在些許錯誤，如「陪房」譯為「お部屋附」（頁229）、「通房大丫頭」譯為「部屋を通しての大女中」（頁245），此譯法皆為字面直譯，且在注釋解釋詞彙時，並未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因此此種譯法無法使讀者了解陪房是「陪嫁之婢」、通房是「可與主子過夜之婢」的意思。又如將「昭君套」譯為「王昭君式の羽織」（頁256），然昭君套為保暖用的帽套、羽織為穿在和服外的外套，兩物穿戴的位置與形制並不相同，此種誤譯，當出於對文化器物的不熟悉所導致。

此外，亦有部分字詞的翻譯有不精準的現象，如：「輩數」譯為「身柄」（頁259）、「媳婦兒」譯為「よめ」和「嫁女」（頁263、264）、「一早」譯為「早朝」（頁274）等。然「身柄」指的是一個人的身分，社經地位、親屬關係、家庭背景、年齡等亦可涵括其中，但小說此處是指王熙鳳不清楚和劉姥姥的親屬關係上的輩分與如何稱呼，故此處譯法，則略顯模糊；「よめ」（嫁）則是指「已婚婦女」，但在《紅樓夢》中的「媳婦兒」的意思，指的是「已嫁的僕婦」，雖已指出「已婚婦女」的身分，但「僕婢」的身分卻未譯出，易與賈府中其餘已婚婦女有所混淆；將「老太太」（史太君）與「太太」（王夫人）同譯為「御隱居様」，則無從顯出兩人的親屬尊卑關係；「早朝」所指的是早晨，但原文的「一

早」是指劉姥姥在天一亮就趕著入京，因此帶有「立刻、迅速」的速度感，但無論是注釋的「早朝」或是譯文的「今朝は早朝から」均失去此種速度感，而必須依靠「往這裏趕」（此屋敷に駈け付けた）方可顯示此種立即性的倉促感。因此此種類型的翻譯上，雖將一部分的性質譯出，但仍在細微之處仍有可待商榷之處。

因此宮崎繁吉譯文的特徵與得失，可歸納於下：

1. 翻譯特徵為：遵循漢文訓讀的翻譯模式，但不為漢文訓讀體所拘束，而能夠以文雅且口語的日語進行翻譯。
2. 翻譯優點有三：一為善於補充人物在說話當下時的性格展露；二為善用日語俗語詮釋漢語俗語；三為能夠依照人物關係而選用適當的翻譯詞彙。
3. 翻譯缺失有三：一為使用文雅的口語進行翻譯，而未能凸顯出人物身分與社會階級的聲腔差異；二為不熟悉中國器物，而導致翻譯上的偏誤；三為部分翻譯用詞不精準，而喪失原文的含意。

綜觀宮崎繁吉的譯文，由於是遵循漢文訓讀的翻譯模式進行翻譯，因此在文句理解上整體而言並無重大的誤解與誤譯，且不被原文或漢文訓讀體所拘束，而能夠用通順的口語將小說內容譯出，由是可知其不僅對《紅樓夢》內容的理解相當透徹，同時能夠區別白話文與文言文在文辭使用及句法結構上的差異性。故其譯文無論是做為教材或是宣傳讀物，都是可讓閱讀者便於了解、且不被誤導的傑出譯文。

五、譯者、讀者、教學者多重身分下的個人評點

《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是教學取向的文學選本翻譯著作，但是在翻譯的同時，因宮崎繁吉依己意將選文分為數段以便教學講述，然在其譯文之後，部分段落附有宮崎繁吉個人的評點，且這些評點文字，向來為過去的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文特將此評點內容提出、並論述宮崎繁

吉評點內容的意義與功能。至於《支那戲曲小説文鈔釋》的評點配置，則如下圖所示：

原文	字解	義解	評點
鳳姐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買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備且去罷。」晚飯後，備再來話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買蓉方慢慢退去。	字解 接聲 鳳姐の聲を取次いで○指示 さしづ○出了半日神 半日は暫時なり、神は心なり、暫時心を喪つたやうにしてゐると也○遣會子 此時刻なり、今といふに同じ○沒精神 話さうと云ふ心がないと也。	義解 鳳姐は又た何か一事をもひ出したと見え、窓から顔出して蓉さん戻つてお出なさいと呼ばつたが、窓の外にゐた幾人かのもは其聲を取次いで蓉の旦那早くお出なさいといつたので、買蓉は急いで立戻つて行儀よく手を下げて鳳姐の側に侍立し、何の指圖があるかと聽いてゐたが、鳳姐は緩くりして茶どものみ、暫らくは氣の扱けたものゝやうにして、果ては笑ひ出し、よしておこようとお前もお歸り、今晚御飯が濟んだ後で話しにゐいて、今は此通りに客様もあつて私も話したい氣に爲らぬからといつたので、買蓉は徐徐として出て行いた。	寧國府の買蓉を點綴したのは、貧賤人と富貴人との舉止動作が如何に異なるかを示す爲めて、所謂の反映の筆。

圖 1 《支那戲曲小説文鈔釋·紅樓夢》第 35 段版面配置。

上方大字為筆者所加。

由上圖可見，宮崎繁吉的評點文字附於「義解」的白話翻譯之後，但缺乏字體上的變化以區隔譯文內容、又無如「字解」、「義解」般的標題，造成這些評點內容極易與譯文內容相混淆。前行研究者未能注意

到此，或也是出於相同原因。至於宮崎繁吉的《紅樓夢》評點共計6條，為便於對內容進行解析，茲彙錄評點內容於下：

擔擔衣服以下的文字，將榮國府前的光景描繪得如畫一般，妙。⁴⁶
（第2段評，頁228）

由周瑞家的之口，寫出王熙鳳的容貌風采，如見其人，妙。⁴⁷（第10段評，頁243）

這一節的容貌描寫極為生動。⁴⁸（第16段評，頁251）

這一段寫出榮國府的富麗盡其所能的烘托其妙處，令人目眩心驚，讚嘆此巧心妍手之筆。此外，寫王熙鳳的嬌懶亦為妙處。⁴⁹
（第22段評，頁258）

用寧國府的賈蓉作點綴，將貧賤人與富貴人在行為舉止上的差異表現出來，此即反襯之筆。⁵⁰（第35段評，頁272-273）

《紅樓夢》無不描寫得緻密新麗，希可加入一些《水滸傳》的雄宕。⁵¹（第43段評，頁284）

由以上六條評點，不難發現宮崎繁吉對於《紅樓夢》的關注面向，大抵皆在小說創作的寫作藝術層面上，尤著重於人與物的外在描寫，且同時點出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在行為舉止上的表現差異：如第2段所評為劉姥姥見到賈府下人閒時的體貌；第10段所寫為周瑞家的對劉姥姥說明王熙鳳的容貌與才幹，從旁人之口強化王熙鳳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第16段寫賈府屋內陳設，但劉姥姥未曾見過，故對這類器物感到好奇；第22段從

⁴⁶ 「擔擔衣服以下の文字、能く榮國府前の光景を寫して畫のやうだ、妙。」

⁴⁷ 「周瑞の細君の口から王熙鳳の容貌風采を寫し出し、就て觀るがやうにある、妙。」

⁴⁸ 「此一節の形容は尤も妙を極めてあるやうにおもはるゝ。」

⁴⁹ 「此一段、榮國府中の富麗を寫して烘染の妙を盡し、人をして目眩し心驚しむ、巧心妍手の筆尖といはねばならぬ、王熙鳳が嬌懶を寫すの處も亦尤も妙。」

⁵⁰ 「寧國府の賈蓉を點綴したのは、貧賤人と富貴人との舉止動作が如何に異なるかを示す為めで、所謂の反映の筆。」

⁵¹ 「紅樓夢の筆は何處までも緻密新麗にある、水滸傳の雄宕な處を少しばかり加へたいもの。」

王熙鳳的衣著展現其富貴，再從行為的描述，顯示王熙鳳待客的不疾不徐；第35段則特指出同是與王熙鳳互動，但賈蓉與劉姥姥在言行上的差異，並歸因於是社會階級的不同所致；第43段則是從作品整體風格進行總評，並與《水滸傳》相較，指出兩部小說不同的寫作風格與可相互補足之處。

從這幾段評語，可以從中得見宮崎繁吉身為譯者與讀者的雙重身分下，以讀者的角度對小說內容進行評論，且注意到「劉姥姥一入榮國府」故事當中值得被注意的人物塑造與身分對比。從此種評論角度與其在〈紅樓夢解題〉表示此回值得注意的「從鄉下人觀看服食鋪陳之盛，並將貴族的生活光景巧妙地描繪而出」寫作特色可相呼應，一則強化了從劉姥姥視角所突顯出的賈府豪貴，兼表現出劉姥姥身處在此環境中的謹慎，突顯出不同身分所造成的價值觀與言行反應。

而第43段的評語，雖同為從文學寫作技巧的層面進行評論，但此段評點是從較宏觀的角度評論《紅樓夢》的寫作風格，因此不僅是對「劉姥姥一入榮國府」、更是宮崎繁吉對《紅樓夢》的總評，且從寫作風格比較《紅樓夢》與《水滸傳》，認同《紅樓夢》善於描寫生活細節、《水滸傳》則長於表現出雄宕氣勢，以此對照中兩部小說的不同風格。

若參照《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節譯《水滸傳》之內容，為第四回〈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台山〉的「魯智深大鬧五台山」一節，該回描述魯智深在寺中大鬧，皈依後卻又在市井中與人發生衝突，使長老不得不另安排魯智深的去處。此節對於魯智深的魯莽性格與爭鬥場面表現得極為生動，與《紅樓夢》「劉姥姥一進榮國府」著重於劉姥姥看見賈府內外景觀後的情緒表現相較，則《水滸傳》確實生動有餘、《紅樓夢》則是在靜中寫動，方可顯示生活種種的細膩處。以此對比，《紅樓夢》可激起讀者情緒起伏的戲劇張力則明顯不及《水滸傳》。因此宮崎繁吉此評語，一則是認同了兩書不同的寫作風格，但又認為《紅樓夢》如可在細膩之處添加些許《水滸傳》的雄渾，或可引起讀者閱讀

小說的興趣與感官上的刺激，讓讀者更能夠接受《紅樓夢》，也同時顯出兩部小說在寫作風格上的差異性。

除此之外，日本漢學家進行小說寫作風格間的比較時，常將《紅樓夢》與《水滸傳》並論，所持觀點皆從文風的陽剛與陰柔進行對照，且稱此二作為「中國小說中的日月」。這類論點，如：

笹川臨風：「《水滸》以雄壯為優，《紅樓夢》則以幽艷取勝。若將其作的至妙之處兩相對比，必不相讓。」⁵²

岸春風樓：「小說《紅樓夢》是清朝三百年第一的傑作，且可兼與元代的《水滸傳》相比，皆是上下四千年以來無以倫比的長篇小說。」⁵³

鹽谷溫：「在小說上，有《紅樓夢》足以與《水滸》、《西遊》的地位相較。事實上，《西遊記》的幽玄奇怪，《水滸傳》的豪宕博大，《紅樓夢》的華麗豐贍，此可謂天、地、人三才之配。」⁵⁴

宮原民平：「這是清代小說中位居第一的名篇，可與元代的《水滸傳》相對，是中國小說的日月。」⁵⁵

四人之中，除笹川臨風的論點早於宮崎繁吉外，岸春風樓等人均晚於宮崎繁吉。且其觀點與宮崎繁吉之說極為相似，認為兩部小說的地位是對

⁵² 「水滸は雄壯を以て優り、紅樓夢は幽艷を以て優る。若し其作の妙なるに至ては二者相比して譲らざらん。」日・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7），頁311。

⁵³ 「小説紅樓夢は清朝三百年第一の傑作にして、兼して元代の水滸傳と共に、上下四千年を通じて比類無き大篇なり。」參見日・岸春風樓，《新譯紅樓夢（上）》（東京：文教社，1916），頁1。

⁵⁴ 「小説に紅樓夢あり、以て水滸・西遊と相當るに足りす。實際西遊記の幽玄奇怪なる、水滸傳の豪宕博大なる、紅樓夢の華麗豐贍なる、これは天・地・人の三才に配すべく、」參見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頁514。

⁵⁵ 「これは清代小説中の第一に位する名篇で、元の『水滸傳』と相對して、支那小説の日月である。」參見日・宮原民平，《支那小説戲曲史概説》（東京：共立社，1925），頁283。

等的，理由則是從風格的「陽剛／陰柔」與「博大／細緻」的差異進行對比。是以可見，從明治時期以降，《紅樓夢》與《水滸傳》的寫作風格對照幾成日本漢學界的研究範式，也足見宮崎繁吉在譯後總評的觀點乃是前有所承、且為後世所接受。

而宮崎繁吉在翻譯過程中所加的評點，固然是其以身為讀者的角度所設。如若將這些評點內容與《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教學功能相結合，則另可從其教師身分思考這些評點在教學上對學生提點的功能。如前五條評點則可提點該處小說人物與場景的塑造與身分對比，第六條評點則可使學生與過去學習《水滸傳》的經驗相聯繫，並藉此了解兩部小說在中國小說史的重要性、以及寫作風格的不同。因此宮崎繁吉的評點，除了是個人意見的展現，同時也是教學現場中的重點提示，使讀者得以從評點中了解該段有何值得注意之處。

因此宮崎繁吉在翻譯之餘所加的評點，雖然內容不多、且為過去論者所忽略，但與譯文、及其〈紅樓夢解題〉相對照，不僅補足了〈紅樓夢解題〉中未能細談的人物塑造與文學比較等內容，且具體呈現《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翻譯、研究、教學、評論等多元形式與功用，也顯示出宮崎繁吉在此書中的多重身分。

六、結語：宮崎繁吉譯本對《紅樓夢》教學與翻譯的啟示

以上經由《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紅樓夢》內容，解析宮崎繁吉對《紅樓夢》的理解體現於研究、翻譯、教學、評論等四大方面，且各方面均有個人的見地與成效。在研究方面，宮崎繁吉於創作手法、作者考證、後代續作情形、內容大要與影射、選文原因等層面均有述及。雖然在宮崎繁吉所處的時代，由於在日本通行的是程高系統的本子，而未能見到脂本與其他研究資料，在此資料缺乏的情形，仍對當時日本通行的「百二十回俱出曹雪芹之手」提出質疑，且對於《紅樓夢》的評論

亦有多處與脂批可通，由是可知其於《紅樓夢》的敏銳度，讓他在簡要的〈紅樓夢解題〉中，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見解，此見解與胡適《紅樓夢考證》相同、卻又早於胡適十六年，因此不論是在中日紅學界，宮崎繁吉提出之論，可說是具有前瞻性的突破。且〈紅樓夢解題〉一文雖短、卻簡要地介紹與分析《紅樓夢》中多層面的議題，對於教學與文學推廣而言，應有助於日本讀者對《紅樓夢》有正確的認識。

在翻譯方面，宮崎繁吉選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為翻譯對象，採取傳統的「漢文訓讀」為翻譯方式，並分為43小段、以逐段的「和漢對譯」方式進行對照，並列有「字解」一項，有利於閱讀者理解原文與譯文的文辭對應、與特殊詞彙的涵義。然宮崎繁吉雖採訓讀進行翻譯，但其譯文並不拘束於漢文訓讀體的古拗用語及文法，而能夠正確的理解、並採取文雅且口語化的日文進行翻譯，同時對於人物情感有所補充。然或因受限於《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為宮崎繁吉的教學用書，因此文辭的文雅化，雖符合教學現場的語言教育，但從小說創作的觀點而言，文雅的譯文則難免無法表現出人物不同身分的語言聲腔差異。除此之外，宮崎繁吉對於小說內容的整體理解雖無錯誤，但仍有部分語詞，或因不熟悉中國器物、或出於用詞不精準，導致細節翻譯上的偏誤，雖是小瑕疵，終不能損其對小說原文的完整理解。

在教學層面，本論文從過去的研究者忽略宮崎繁吉在小說六處段落的評點、及全書的選文標準進行分析，以解讀《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的四部作品的共通性，由此推測宮崎繁吉在進行教學時，應著重於文義教學、甚至是文學教學的層面上，理由在於：《紅樓夢》所收評點內容，均涉及人物塑造與創作風格的評析；全書的作品選錄則有「人物精簡」、「情節單純」此種以「一人一事」為主軸的共通性，而撇除了一事貫穿數回的單元故事。經此兩種層面的考察，可推測宮崎繁吉在選擇文學作品以進行教學時，著重的即為便於讀者接受與文學欣賞的層面，故選擇「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應是考量《紅樓夢》的全書架構、並引起讀者興趣後的決定，以避免選擇與其他情節無相對應的段落、或

是以大量韻文為主體的回目，以維持讀者興趣、並經由此回的「千里伏線」所伏的二進與三進的故事，啟發讀者閱讀同一單元故事的契機。

因此本文經由考察宮崎繁吉的《紅樓夢》翻譯，可知其於《紅樓夢》研究有其敏銳的見解，於翻譯與教學上則能夠考量讀者的閱讀興趣，以選擇適當的內容與翻譯語言，以便於讀者理解。由此而言，可知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紅樓夢》翻譯，當是合研究、翻譯與教學為一體的重要著作。因此經由本論文的分析，祈可補足當前對《紅樓夢》日文節譯本研究的缺乏，使《紅樓夢》日文譯本的研究能夠有新的開展空間。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3。

【日】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

【日】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7。

陳慶浩編，《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日】岸春風樓，《新譯紅樓夢·上》，東京：文教社，1916。

【日】宮原民平，《支那小說戲曲史概說》，東京：共立社，1925。

【日】宮崎繁吉，《支那近世文學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

【日】笹川臨風，《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7。

【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

【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日】古田島洋介、湯城吉信，《漢文訓讀入門》，東京：明治書院，2011。

【英】David Lodge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臺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06。

【捷克】Peter Newmark著，賴慈芸編譯，《翻譯教程》，臺北：臺灣培生教育出版社，2005。

一粟編，《紅樓夢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歐麗娟，《大觀紅樓·母神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歐麗娟，《紅樓夢人物立體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7。

胡文彬，《《紅樓夢》在國外》，北京：中華書局，1993。

（二）期刊論文

【日】伊藤漱平，〈《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江戶幕府末年至現代〉，《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445-488。

【日】森中美樹，〈語学教科書としての『紅樓夢』：東京外国語学校時代の書入を中心として〉，勝山稔編，《小説・芸術から見た海域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10。頁259-289。

【韓】崔溶澈，〈《紅樓夢》翻譯本及其翻譯方法〉，徐志平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547-570。

宋丹，〈《紅樓夢》最早抵日時間的再確認：基於對村上文書『差出帳』的調查〉，《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2輯（2017.3），頁227-244。

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第9期（2010.6），頁97-122。

藍弘岳，〈荻生徂徠的漢文學習方法論：訓讀與「譯學」〉，彭小妍編，《翻譯與跨文化流動：知識建構、文本與文體的傳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頁95-130。

張翔娜，〈《紅樓夢》在日本〉，《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八卷第4期（2008.12），頁68-70。

(三) 學位論文

宋丹，《《紅樓夢》日譯本研究（1892-2015）》，天津：南開大學日語系博士論文，2015。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Chao Xue Qin & Gao E & Feng Qi Yong, *Hong Lou Meng Jiao Zhu*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aipei: Li Ren Publishing Co., 2003.
- Choe Yong Chul, “Hong Lou Meng Fan Yi Ben Ji Qi Fan Yi Fang Fa”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Method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Xu Zhi Ping, *Chuan Bo Yu Jiao Rong: Di Er Jie Zhong Guo Xiao Shuo Xi Qu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Novels and Dramas*), Taipei: Li Ren Publishing Co., 2006, pp.547-570.
- Hu Shih, *Zhong Guo Zhang Hui Xiao Shuo Kao Zheng*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Chinese Chaptered Novels*),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6.
- Hu Wen Bin, *Hong Lou Meng Zai Guo Wai*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Foreign Count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Itou Souhei, “Hong Lou Meng Zai Ri Ben De Liu Chan: Jiang Hu Mu Fu Mo Nian Zhi Xian Dai” (The Spreading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t Japan: The Edo Period to Modern), in *Hong Lou Meng Yan Jiu Ji Kan* (*The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Vol.14 (1989), pp.445-488.
- Miyazaki Shigekichi,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The Selec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 and Novel*),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Press, 1905.
- Miyazaki Shigekichi, *Shina Kinsei Bungakushi*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Press, 1905.
- Morinaka Miki, “Gogaku Kyokasho Toshite No Koromu: Tokyo Gaikokugo Gakko Jidai no Kakiire wo Chushin toshite” (Language Textbook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entered on the Record of the Tokyo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era), in Katsuyama Minoru, *Shosetsu Geijutsu Kara Mita Kaiiki Koryu* (*Through Navels and Art to See the Overseas Exchange*), Tokyo: Kyuko Syoin Publishing Co., 2010, pp.259-289.

-
- Song Dan, *Hong Lou Meng Ri Yi Ben Yan Jiu (1892-2015) (The Study o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1892-2015))*,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15.
- Sun Yu Ming, *Ri Ben Hong Xue Shi Gao (History of Japan Redology)*,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06.

附錄：宮崎繁吉所譯《紅樓夢》各段內容對照表

※按：本表所錄之內容，除為訓讀而標註的訓點未錄外，其餘文字與標點使用，均以《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內容為依據，不另行改動。

段次	宮崎繁吉譯本所收各段內容	各段評點
1	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	
2	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	擔擔衣服以下的文字，將榮國府前的光景描繪得如畫一般，妙。
3	眾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爾從這邊遶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	
4	劉老老謝了，遂帶著板兒，繞至後門上。……周太媽，有個老奶奶來找爾呢。	
5	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爾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裏還記得我們。說著，來至房中。	
6	周瑞家的命顧的小了頭倒上茶來，吃著，……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	
7	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當日太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	
8	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小了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	
9	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	

段次	宮崎繁吉譯本所收各段內容	各段評點
10	周瑞家的聽了道，瞎，我的老老，告訴不得爾呢。……小了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	由周瑞家的之口，寫出王熙鳳的容貌風采，如見其人，妙。
11	周瑞家的聽了，便連忙起身，催著劉老老快走，……隨著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側廳。	
12	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裏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平兒聽了，便做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在這裏坐著就是了。	
13	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	
14	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裏，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	
15	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了頭。	
16	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	這一節的容貌描寫極為生動。
17	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爾。說著，迎出去了。	
18	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	
19	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著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入，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	
20	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躡到這邊屋內。	

段次	宮崎繁吉譯本所收各段內容	各段評點
21	只見門外銅鈎懸著大紅灑花軟簾，……傍邊有銀唾盒。	
22	那鳳姐家常帶著紫貂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	這一段寫出榮國府的富麗盡其所能的烘托其妙處，令人目眩心驚，讚嘆此巧心妍手之筆。此外，寫王熙鳳的嬌懶亦為妙處。
23	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時，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	
24	鳳姐忙說，周姐姐攙著不拜罷，我年輕不太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	
25	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	
26	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太走動，都疏遠了，……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	
27	這裏，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甚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	
28	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	
29	劉老老道，也沒甚說的，不過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	
30	劉老老會意，未語，先紅的臉，……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	
31	鳳姐忙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	

段次	宮崎繁吉譯本所收各段內容	各段評點
32	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孀子說，……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	
33	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著，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孀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孀子只當可憐姪兒罷。	
34	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拏去，別由他們亂磁。說著，便起身出去了。	
35	鳳姐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賈蓉方慢慢退去。	用寧國府的賈蓉作點綴，將貧賤人與富貴人在行為舉止上的差異表現出來，此即反襯之筆。
36	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孀姪兒不為別的……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	
37	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裏來。	
38	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齧唇咂嘴的道謝。	
39	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孀老人家。……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孀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	
40	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憑他怎樣，孀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	

段次	宮崎繁吉譯本所收各段內容	各段評點
41	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道，……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來了。	
42	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	
43	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出了。	《紅樓夢》無不描寫得緻密新麗，希可加入一些《水滸傳》的雄宕。

**Beyond Translation:
the Study of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Miyazaki Shigekichi’s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Heng-I Su*

Abstract

Miyazaki Shigekichi’s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was published in 1905. This book is among which 4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s novels such as “*Water Margin*”,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The Peach Blossom Fan*”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ere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In this book was chosen ‘Granny Liu First Time Visited Rong Mant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ranslated it.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is one of the early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is a collection of lectures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Miyazaki Shigekichi’s teaching at Waseda University. The translation form i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Chinese, and used Kanbun Kundoku to translated all of the literary works in this book, in this way, that book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for the readers and the researchers. Therefore, it has its importan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This thesis is a study of translated into the study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Miyazaki Shigekichi’s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Because this book has not only included translations, but also the results of Miyazaki Shigekichi’s research on the author, version, theology, literary aesthetics, et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s and novels. This thesis first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nalyzes is Miyazaki Shigekichi's research result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second step is analysis of his translation and feature of translation. Finally, from the overall selection of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to analysis the reason why Miyazaki Shigekichi was chosen 'Granny Liu First Time Visited Rong Mantion' as the target of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gradually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Miyazaki Shigekichi's research,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Miyazaki Shigekichi has adopted the "one person and one theme" as the selection criterion,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selected text in the whole work. Through the single event,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 runs through,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reading interest of foreign readers. In order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unctions of literary research, teaching and promo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novels and dramas have gained attention in Japan from their works.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hina Gikyoku Shosetsubun Shoshaku*", Japanese selected translation, Miyazaki Shigekichi, Granny Liu